

城镇化境遇及其对两性性别观念的型塑

孙超¹, 刘爱玉²

(1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2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5年数据为依托, 分析了城镇化境遇对两性性别观念的型塑。城镇化境遇反映的是人们参与到城镇化过程中的状况所分享的共同生活机会与经济利益, 户籍身份、教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的城镇化境遇。研究发现, 两性对于平等性别关系的认知与接纳因城镇化境遇不同而有差别。越是主动参与城镇化者, 其性别观念越是趋向现代。选择性农转非人群的性别观念得分最高, 最偏现代一端, 游离者的性别观念得分最低, 最偏传统一端。积极参与到城镇化进程中对于女性而言意义重大, 城镇化经历对于其性别观念的平等化效应大于男性。性别观念是性别角色的社会实践、家庭性别角色分工实践、城镇化境遇三者交互影响的结果。性别平等实践的发展, 有赖于引导一种更为包容性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两性教育平等实践的坚持和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入和市民化。

关键词: 城镇化境遇; 性别观念; 夫妻地位关系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668(2020)05-0112-10

Urbanization Situation and Its Shaping of Gender Attitudes

SUN Chao¹, LIU Ai-yu²

(1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CGSS 2015,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haping of gender attitudes in urbanization situations. The urbanization situation reflects the common living opportunities and economic benefits shared by people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Hukou and education levels impact people's urbanization situation largel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of equal gender status differs depending on the urbanization situation. The more actively involved in urbanization, the more modern their gender attitudes are. The active rural-to-urban hukou conversion have the highest gender attitude scores, as the most modern side, and the peasants have the lowest gender attitude scores, as the most traditional side. Participating in urbanization actively has great significances for women, and the equalization effect of urbanization experience on their gender attitudes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men. The attitude of gender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ocial practice of gender roles, the

收稿日期: 2020-04-22; 修订日期: 2020-06-24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大学管理科学数据中心智库课题(2017KEY07)“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性别收入差距成因和对策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孙超(1986—), 男,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助理研究员; 刘爱玉(1964—), 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

practice of family gender roles and the urbanization situ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gender equality depends on creating a more inclusive urbanization strategy, the adherence to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and the urban social integration and citizenship for the rural migrant population.

Key words: Urbanization Situation; Gender Attitudes; Gender Status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1 研究问题的提出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以经济增长、教育扩张、工业化、城镇化与人口转型等为主要特征的变革使中国社会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城镇化的影响尤为突出。

所谓的城镇化是指社会经济关系、人口、生活方式等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过程。伴随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迁入到城市,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改变。

与西方国家工业化直接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不同,中国的城市化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扩张,又包括乡村的城镇化,并在城市化发展战略、制度安排、内在机制、推动方式上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刘爱玉 2012; 乔晓春 2019)。

1978 年以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是以国家为主体、以重工业为核心、资本排斥劳动的工业化、城镇化战略。为保证该战略的实施,在制度安排上采取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严格控制农民进城的举措。从 1958 年严格户籍制度确立到 1978 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总共增加 6524 万人,平均每年增加 326 万人,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为 0.08% (刘爱玉 2012)。

1978 年之后的城市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工业城镇化(1978 - 1994),土地城镇化(1995 - 2011)和人口城镇化(2012 年至今)(周飞舟等 2018)。从制度安排上看,最重要的变化是户籍制度逐步改革,对农民流动与进城的限制减少,由此快速提升了中国的城镇化水平。1979 - 2018 年的 40 年间,城市人口共增加 64642 万人,平均每年增加 1616 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 1.02%,城镇人口比例由 1979 年的 18.96% 上升到了 2018 年的 59.58%。相比之下,英国的城市化水平由 1750 年的 25% 到 1860 年的 62% 左右,用时 110 年;美国由 1860 年的 20% 提高到 1940 年的 56.3%,用时 80 年。两个国家的年均城市化率分别为 0.34%、0.45%,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城镇化的成就是巨大的。

如此大规模、高速的城镇化进程在重塑社会结构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极大地型塑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其中包括对两性关系及其规范的认知。本文核心关注的问题是:性别观念如何因个体城镇化境遇的不同而有别?

性别观念是指人们有关男人和女人应当有怎样适当的规范、社会分工、行为模式和两性关系模式的信念和看法(Williams & Best 1990),它既是性别平等基本国策实现程度的重要指标,也对婚姻与生育行为、工作意愿及职业发展、工作 - 家庭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等方面有重要影响,以此切入进行研究的实践意义毋庸置疑。

城镇化境遇指个体因为在城镇化过程中处于不同的状况而分享到具有差异性的生活机会与经济利益。城镇化境遇概念不是基于个人特质的直接分析,或对城镇化的结构性研究,而是从城镇化中抽取一些关键要素,如户籍身份、教育程度等,展示它们带来的具有明显差异的境遇状况,将城镇化对个体的影响放入这些处境中加以考察。城镇化境遇的提出,受到洛克伍德关于工作境遇概念的启发。洛克伍德认为工作境遇反映的是个体依其工作在劳动分工中的地位而展示的一系列社会关系(Lockwood, 1958),个体因拥有的资源不同而在劳动分工中有不同的位置与权威。

在中国的城镇化大潮中,拥有不同户籍身份的人,因居住和就业的不同形态,因资源占有的不同而会在城镇化进程的参与状况和地位境遇上有别。城镇化境遇的一端是那些农业户籍出身、农村居住、农村务农的人群,他们几乎游离于城镇化进程之外,另一端是非农业户籍出身、居住城镇、非农就业的人群。根据 2006 年 3 月国家统计局《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城镇人口包括了在调查地居住半年及以上的流动人

口。因此,在2018年统计为城镇人口的8.137亿人中,实际上有1.73亿人户籍为农业、在城镇居住超过6个月的非农劳动者(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8)。此外,还有目前不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是参与了城镇化过程的务工经商者,以及一些曾经在城镇打工目前返乡的人群,在统一的城镇人口概念下,有着机遇极为不同的异质性人群(穆光宗2014)。

近年来学界有不少关于性别观念及其型塑的研究(刘爱玉等2014、2019;杨菊华等2014;许琪2016;孙晓冬等2016;卿石松2018;Shu2004、2012),但是对于参与城镇化机会和介入程度不同的人群在性别观念上有何特点,则尚未有专门的研究,而这也是本文的旨趣所在。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早在1938年,美国社会学家沃思在其“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性”一文中,即强调了城市性对于人们社会关系及价值观念的影响(Wirth,1938)。晚近关于城镇化对于性别观念的影响的讨论,基本上被置于现代化理论的范式下。

性别观念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论点是自18世纪以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改善了女性的境遇,因为人们可以通过改变自致地位(如职业、收入、教育)来打破先赋地位的束缚,因而有利于女性改变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Ramirez et. al.,1997)。同时,生育率下降,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增加,女性的教育水平提高以及女性经济社会地位的改善,这些都会促进态度的改变(Inglehart & Norris,2003)。人们的性别观念是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且这种转变在跨国之间具有普遍性。

传统性别观念有性别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s),即人们习惯地认为两性存在稳定的、固化的和对立的性别气质和社会分工。性别刻板印象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性别气质的,常常被视为二元对立:男性坚强与女性温柔;二是性别角色分工的:男性为公共领域与女性为私人领域;三是有关两性关系的:男性为主与女人为辅(Thornton & Young-DeMarco,2001)。现代性别观念强调男女平等,打破性别传统分工,女性进入公共领域,两性共同承担社会与家庭责任。

性别观念的现代化理论因其线性、西方化意涵而遭遇学者们的批评,一些学者提出了利益取向的解释框架,认为性别观念改变的根本在于支持性别平等的收益大于成本(Gibbons et. al.,1997)。一些学者提出个体能动的理论解释框架,认为个体的实践活动促进性别观念的变化(Thornton et. al.1983;Catherine et. al.,2004),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性别观念的社会建构论(West & Zimmerman,1987)。

国内一些学者近年来对性别观念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虽未有关于不同城镇化境遇人群性别观念的专门研究,但对于城镇化过程中的某些特别人群有不少令人启发的分析,比如刘爱玉、佟新在分析中国男女性别观念现状及影响因素时提出,人口流动也是影响男女性别观念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刘爱玉等2014)。在对1990-2010年两性性别角色观念变迁的分析上,学者们发现男性比女性更传统,农村男性比城镇男性更传统,农村女性比城镇女性更传统(杨菊华等2014;刘爱玉2019),城镇男性向传统观念回潮的速度最快(刘爱玉2019)。许琪的研究指出,外出务工(是否跨省流动、是否返乡)有助于削弱农村人对姓氏继承和性别分工的传统观念,但并未动摇财产继承这一最核心的父系家庭制度,而且外出务工对姓氏继承观念和性别分工观念的影响在女性样本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进城务工对农村人传统性别观念的削弱作用表现出由表及里、逐层推进的特点,作为传统性别观念的既得利益者,农村男性的传统性别观念很难发生与女性同等程度的转变(许琪2016)。杨凡等的研究认为,人口流动(外出流动超过6个月)有利于促进农村已婚妇女的性别观念向现代型转变,而且不同类型的流动对性别观念的转变影响程度不同。单独流动的妇女观念最为现代,夫妻双方一起流动的妇女相对传统。人口流动对农村已婚妇女性别观念转变的促进作用以家庭经济地位关系为基础,不仅受到经济收入的绝对水平的影响,也受到夫妻间相对经济水平的影响(杨凡、曾巧玲2016)。

如果从城镇化进程中不同人群的境遇来看,上述研究主要是关注了某一种或者几种特别人群的性别观念状况:或者是农村与城市二分的思路(刘爱玉等2014),或者是针对跨省流动或者返乡人员(许琪2016),

或者是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流动人口(杨凡等 2016) 而未有将各种不同城镇化经历、介入程度不同的人群置于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进行分析。我们认为,个体在城镇化过程中捕捉机会的能力不同,参与的程度不同,会因此具有不同的城镇化境遇,并型塑着其对于两性关系的认知,有必要对不同城镇化境遇人群的性别观念现状及其差异进行评估。

如何对不同城镇化境遇的人群的性别观念进行分析?刘爱玉、佟新在 2014 年分析中国人性别观念及其影响因素时,曾提出一个性别地位实践理论,在分析框架中,户籍被视为先赋因素,流动被作为自致因素,并以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证明了先赋地位、自致地位及其两者型塑的夫妻地位关系对于性别观念的影响(刘爱玉等 2014)。该分析框架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在如何认识户籍、流动对于性别观念的影响方面,现在来看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从中国社会的实践看,户籍与流动两者之间有紧密的关系,户籍对于一些不流动、不参与城镇化者可能是先赋性的,但是对于一些人,特别是通过各种努力而改变户籍身份者,则是自致的。

因此,我们需要更加动态地对性别观念型塑的各种因素进行考察,本文提出城镇化境遇概念,对性别地位实践分析框架进行修订完善。

本文将控制先赋地位(性别、年龄、家庭出身)、自致地位(教育、收入与党员身份)、夫妻相对地位(夫妻就业参与状况和家庭经济依赖关系),考察城镇化境遇对于性别观念的型塑。

基于以往的经验研究以及理论梳理,本文的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 1:两性对于平等性别关系的认知与接纳因城镇化境遇不同而有差别。越是主动参与城镇化者,其性别观念越是趋向现代。

假设 2:两性因自致地位的差异而呈现性别观念的差异,自致地位越高,性别观念越是趋向现代。

假设 3:性别观念会因夫妻地位关系的不同而有别,处于相对地位低并依赖另一方的性别观念更为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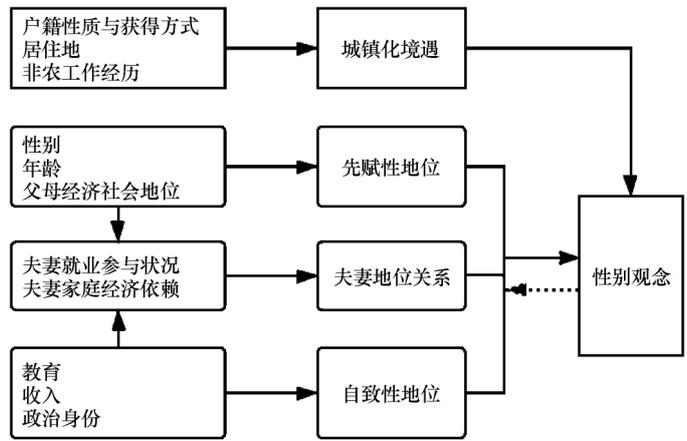


图 1 性别角色观念形塑的地位实践论分析框架

3 数据与变量

3.1 数据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 2015 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数据。CGSS 项目自 2003 年起,每年对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的 10000 多户家庭进行一次连续性横截面调查,核心关注社会结构和生活质量的互动与变化。调查从社会阶层、政党和利益群体、工作和社区组织、家庭和亲子关系、人际和组织间的网络,以及由人口和社会经济变量(如性别、年龄、民族、宗教、教育、职业、收入、产权、财富,等等)特性考察社会结构,从健康层面、人口层面、心理层面、社会经济层面以及政治/社区五个维度考察生活质量。数据采集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方法,质量高、代表性好,能够满足研究的基本需要。2015 年度该调查数据样本量为 10968 个,覆盖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 478 个村居。本研究选取 18-64 周岁的已婚和固定同居者为研究对象,在剔除无效值和缺失值后,共获有效样本 5548 人,其中男性 2531 人,女性 3017 人。

3.2 性别观念的测量

CGSS2015 调查问卷关于性别角色观念询问的核心问题是“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在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经因子分析,剔除因子负载过低的“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题项,前四个题项的信度系数为 0.67,较好地反映了人们的性别角色定位、女子不如男、女性依附于男性和就业机会男性优先等传统观念。其选项

有5个:“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我们赋予上述各选项的评分依次为1分、2分、3分、4分和5分,4个指标加总后的总得分作为受访者性别角色分工观念的测量^①。经极差标准化方法处理后^②,我们设定100为最现代的性别分工观念的分值,最性别平等取向,0为极端传统的性别观念分值,最男权取向。从0到100是一个从传统观念向现代观念性别平等观念变动的连续体。

3.3 城镇化境遇及其他控制变量

根据被访者的户籍、户籍获得方式、居住情况、非农工作经历,将城镇化境遇区分为六种情况:(1)游离者,指户籍为农业、居住在农村、无非农工作经历人群;(2)返乡者,指户籍为农业、居住在农村、有非农工作经历人群;(3)流动者,指户籍为农业、调查时居住城镇并计为城市人口但未获得城市户籍人群;(4)政策性农转非,指因为土地征用(包括村改居)、移民安置、家庭团聚、户口改革时当地不再有农业户口等原因而由农业户籍转变为非农业户籍人群;(5)选择性农转非,指为教育、参军、提干、招工、购买等原因而转变为非农业户籍人群;(6)城镇人,指户籍出身为城镇的人群。政策性农转非与选择性农转非人群的区分,参考了郑冰岛、吴晓刚(2013)和谢桂华(2014)等学者关于农转非人群地位获得的相关研究。

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先赋地位变量,性别、年龄和父母教育程度。本文以父亲和母亲教育程度高者作为个体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度,教育区分为两类:父母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上者编码为1,否则为0。

自致地位变量以教育、收入与党员身份进行测量。教育区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中技、大专、大学本科及以上五类;收入是指2014年的个人年总收入,在模型分析时采用计量单位为万元;党员身份区分为党员、非党员。

夫妻相对地位主要考察夫妻就业参与和夫妻家庭经济依赖。夫妻就业参与区分为4个类别:(1)夫妻均工作;(2)丈夫工作、妻子不工作;(3)丈夫不工作、妻子工作;(4)夫妻均不工作。夫妻家庭经济依赖采用Brines在1994年研究时曾经使用的方法(Brines,1994),计算公式为(丈夫收入-妻子收入)/(丈夫收入+妻子收入),其值为-1到+1。-1表示男性对妻子在经济上的完全依赖,+1表示男性向妻子提供了完全的经济支持,0表示双方在经济上彼此没有依赖。正值越大,说明男性对于家庭的经济贡献越大;负值的绝对值越大,说明男性对于家庭的经济贡献越小。

城镇化境遇对这些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

游离者人群的主要特征是:平均年龄49.5岁,63.5%为女性,近9成父母的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本人接受教育少,62.9%为小学及以下,人均年收入在1.28万,有少量的党员,虽然夫妻均工作者居多,但经济上妻子依赖丈夫较多。

返乡者的平均年龄44.2岁,性别比较平衡,最突出的是夫妻均工作的比例在六个人群中很低,丈夫工作妻子不工作的比例最高,女性对丈夫的依赖在六个人群中最高。

流动者的平均年龄42.2岁,六个人群中最年轻,性别比较平衡,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夫妻均工作的比例在六个人群中最高,夫妻均不工作的比例最低。

政策性农转非人群,69.6%是女性,从夫妻就业参与看,丈夫工作妻子不工作的比例较高,为28.2%,仅次于返乡者。

选择性农转非人群,男性的比例高于女性,本人教育程度在六个人群中最高,平均受教育年数为12.7年,其中大专教育程度者占20.9%,大学本科及以上者占27.1%,有着高于其他5个人群的最高年均收入,最高比例的党员。

①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对结果做了稳健性检验,发现可以提炼出一个公因子,并得到一致的回归分析结果。

②极差标准化的公式为 $X_{st} = [(X_i - X_{min}) / (X_{max} - X_{min})]$ (正向指标)。

表 1 样本个人特征与城镇化境遇

	游离者	返乡者	流动者	政策性农转非	选择性农转非	城镇人	合计	统计检验
性别(%)								
女	63.5	48.6	51.2	69.6	41.5	51.4	45.6	Chi ² = 133.02 p = .000
男	36.5	51.4	48.8	30.4	58.5	48.6	54.4	
年龄(岁)								
均值	49.5	44.2	42.2	45.8	44.8	47.1	45.7	F = 71.83 p = 0.000
父母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89.0	77.0	73.8	67.8	61.8	50.8	70.4	Chi ² = 485.49 p = .000
初中及以上	11.0	23.0	26.2	32.2	38.2	49.2	29.6	
教育(%)								
小学及以下	62.9	41.0	30.5	25.1	8.4	7.9	30.8	Chi ² = 2.1e + 03 p = .000
初中	31.6	43.4	44.2	37.8	17.9	25.1	34.0	
高中/职高/技校	5.1	13.2	18.5	20.6	25.7	33.1	19.4	
大专	0.3	1.3	4.4	6.5	20.9	15.2	7.4	
大学本科及以上	0.0	1.1	2.4	10.1	27.1	18.8	8.5	
均值	6.0	7.9	8.6	9.6	12.7	12.0	9.2	F = 483.49 p = 0.000
年收入(万元)								
均值	1.28	1.45	3.69	4.45	6.29	5.71	3.74	F = 8.99 p = 0.000
党员身份(%)								
非党员	97.6	93.1	96.1	92.0	67.6	82.3	90.0	Chi ² = 512.88 p = .000
党员	2.4	6.9	3.9	8.1	32.4	17.7	10.0	
夫妻就业参与								
夫妻均工作	60.5	50.1	61.4	52.4	58.1	49.3	56.3	Chi ² = 220.83 p = .000
丈夫工作妻子不工作	22.5	32.5	27.5	28.2	23.2	22.6	25.3	
丈夫不工作妻子工作	3.9	8.0	5.0	4.3	4.1	5.3	4.9	
夫妻均不工作	13.1	9.3	6.1	15.2	14.6	22.8	13.4	
夫妻经济依赖								
均值	0.37	0.46	0.36	0.30	0.27	0.18	0.32	F = 30.11 p = 0.000
样本量(人)	1230	461	1599	447	487	1324	5548	

城镇人平均年龄 45.7 岁,男性的比例略高于女性,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上者比例在六个人群中最高,平均教育水平仅次于选择性农转非人群,突出的特点是夫妻均工作的比例最低,夫妻均不工作的比例最高,但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赖也是最低的。

总体来看,游离者本人和父母教育程度最低,经济来源为务农收入,收入水

平低,分享的城镇化红利少。选择性农转非者有着最高的平均教育程度,也分享了最多的城镇化红利,走出农村成为城镇人的女性,在经济上也有着更多的自立,不仅显著有别于固守乡村的游离者,也显著有别于政策性农转非人群。相比于游离者,哪怕是最低程度的参与城镇化,也依然会给生活样貌带来不一样的结果。

4 城镇化境遇及其对性别观念的型塑

4.1 差别化的城镇化境遇与性别观念

表 2 分性别描述了不同城镇化境遇人群的性别观念平均得分与标准差。

(1) 就全部样本来看,“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男性同意者为 62.2%,女性同意者为 58.5%;对于“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男性同意者为 45.5%,女性同意者为 43.6%;对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男性同意者为 42.2%,女性同意者为 48.3%;对于“在经济不景气时,应该先解雇女性员工”,男性同意者为 14.0%,女性同意者为 12.4%。总体男性性别观念得分均值为 50.75,女性为 52.1,女性性别观念的开放程度略高于男性,但总体表现出由传统到现代中间地带的特征。

(2) 无论是全部样本、男性样本或是女性样本,不同城镇化境遇人群的性别观念得分之间都存在显著差异,其共同特征是选择性农转非人群的性别观念得分最高,最偏现代一端,游离者的性别观念得分最低,最偏传统一端。

表2 不同城镇化境遇人群的性别观念得分

	全部		男性		女性		性别差异检验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游离者	43.87	17.83	44.38	17.51	43.57	18.01	t=0.760 p=.448
返乡者	50.46	19.05	48.07	18.04	52.99	19.78	t=2.787 p=.006
流动者	51.11	19.20	49.96	18.47	52.20	19.82	t=2.336 p=.020
政策性农转非	54.07	20.62	56.11	18.93	53.18	21.29	t=2.336 p=.020
选择性农转非	58.00	19.98	56.29	20.20	60.40	19.46	t=-1.387 p=.166
城镇人	56.09	19.61	53.55	18.78	58.50	20.08	t=2.241 p=.026
合计	51.48	19.75	50.75	18.96	52.10	20.37	t=4.627 p=.000
不同城镇化境遇人群得分检验	F=19.84 p=0.000		F=6.36 p=0.000		F=15.66 p=0.000		

(3) 不同性别的游离者和选择性农转非者,性别观念得分无统计学显著差异,返乡者、流动者、城镇人之间的性别观念得分有显著性别差异,女性的性别观念得分高于男性,即更偏现代;政策性农转非人群的性别观念得分有差别,但女

性的性别观念得分低于男性,即更偏传统。

4.2 性别观念型塑要素分析

为更好地考察城镇化境遇对于性别观念的影响,我们通过多变量分析方法考察控制先赋地位因素、自致地位因素、夫妻地位关系因素等方面因素后,城镇化境遇对于性别观念的型塑,同时,也比较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城镇化境遇在型塑性别观念差异上的作用。

模型1只纳入了城镇化境遇这一核心自变量,与之前的描述性分析结果相同,选择性农转非者有着最高的性别观念得分,其次是城镇人。模型2加入了性别、年龄和父母教育程度三个先赋性地位因素,模型的解释力由0.056提高0.087,模型3加入了教育、收入和党员身份三个自致地位变量,模型解释力由0.087提高到0.108,模型4纳入夫妻地位关系变量,模型解释力提高到0.112,模型1与模型4比较,可以看出城镇化境遇因素大约贡献了50%左右的对于性别观念差异的解释,性别观念是城镇化境遇、先赋地位、自致地位和夫妻地位关系共同型塑的结果。

对模型4和分别以男性和女性为样本的模型分析结果进行比较,可以看出:

(1) 在控制其他要素情况下,相比于游离者,不论是主动参与城镇化,或者因为制度和结构变迁被纳入到城镇化进程之中,不论是获得了城镇户籍还是短暂的流动,甚至只是在不同城镇流动打工最终返乡,其城镇化经历都会极大地影响到对于两性更为平等的性别关系的认知与接纳;主动、积极参与到城镇化进程中的男女,其性别平等化的效应最大,对于男性的性别规范认知型塑尤为突出。但是女性即使是外出到城镇打工的时间短暂,因为结婚生育或者各种照顾责任返回农村,其城镇化经历对于性别观念的平等化型塑,却要大于男性。

(2) 自致地位因素中,最为重要的是教育,收入和党员身份对于性别观念的作用不显著。苏晓玲关于中国教育与性别观念的研究发现,教育对于性别观念的平等化效应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因为全球化,受过高等教育女性更有可能接触西方性别平等理念(Shu, 2004)。其二,市场化时期对于女性的教育回报增加(Xie & Hannum, 1996),越是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更有可能从市场化改革受益与增权,并由此会强化女性对于自由性别平等的态度(Shu, 2004)。其三,与现代化论证一致,中国经济发展增加了专业和管理职业,对于高等教育需求增加,高等教育扩张对于性别观念平等起到推进作用(Bolzendahl & Myers, 2004)。本文的研究认为,教育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是有利于个体把握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机会,改善了个体的城镇化境遇。一方面是具有更高文化程度者有更强的外出动机和资源,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中的雇主也更青睐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人。而对于能够获得选择性农转非,彻底改变户籍身份成为城镇人的男女而言,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学

历往往是必要的门槛。以是否选择性农转非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父母文化程度、本人教育、收入、政治身份、夫妻就业参与、家庭经济依赖、18岁以下子女数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分析^①,大专文化程度者选择性农转非的优势(odds)是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的3.5倍,大学本科及以上者的优势更是高达8.4倍,如果将教育作为连续型变量,重新进行logistic分析,则教育每增加1年,选择性农转非优势增加30%。

表3 性别观念得分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城镇化境遇(游离者)						
返乡者	6.594***	5.258***	4.610***	4.870***	2.635	6.877***
流动者	7.239***	5.307***	3.975***	3.984***	3.229**	4.236***
政策性农转非	10.20***	8.524***	5.812***	6.056***	9.562***	4.284**
选择性农转非	14.13***	12.45***	6.937***	7.187***	7.990***	6.100***
城镇人	12.23***	10.50***	5.763***	6.046***	5.906***	5.457***
性别(女性)						
男性		-1.573**	-2.541***	-2.357***		
年龄		-0.215***	-0.134***	-0.121***	-0.161***	-0.084*
父母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初中及以上		3.751***	1.924**	1.834**	0.310	2.564**
教育(小学及以下)						
初中			4.630***	4.807***	3.592***	5.397***
高中/职高/技校			7.454***	7.454***	4.233***	10.35***
大专			10.72***	10.41***	5.913***	14.11***
大学本科及以上			11.65***	10.99***	5.713**	15.05***
收入						
			0.0003	-0.001	-0.011	0.017
党员身份(非党员)						
党员			1.121	1.155	1.323	2.059
夫妻就业参与(夫妻都工作)						
丈夫工作妻子不工作				-1.870**	-0.152	-3.219***
丈夫不工作妻子工作				-0.8	0.582	-1.837
夫妻均不工作				-2.612**	-2.256	-3.114**
家庭经济依赖						
				-1.095*	-2.158*	-0.27
常数项	43.87***	54.65***	49.32***	49.75***	51.80***	46.94***
样本	5548	5548	5548	5548	2531	3017
R平方	0.056	0.087	0.108	0.112	0.066	0.156

说明:①括弧中为参照项;②p* < 0.05 p** < .01 p*** < .001。

(3) 夫妻地位关系对于性别观念的影响没有自致地位那么突出,但也很显著。在控制其他因素后,从夫妻就业参与看,丈夫工作妻子不工作、夫妻双方都不工作者,其性别观念显著比夫妻双方均工作者传统;从家庭经济依赖关系看,随着妻子对丈夫经济依赖的增加,男性的性别观念更偏传统,即更认可“男人养家、女人持家”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更认可男性的机会优先以及两性能力上的差异。说明在城镇化过程中,如果女性未能改变对于丈夫的经

济依赖,则性别观念的转变是迟滞的。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978年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机会结构,市场化转型理论探讨了市场转型在客观上如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机遇,包括人们的教育、职业、收入和流动等方面。对于中国人而言,最为重要的机会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得非农工作机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由农民转变为居民,并共享城市文明。个体的城镇化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了其在重要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机会获得的情况,这种机会获得一方面源于大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但也源于个体对于机会的积极把控。参与到伟大的城镇化实践中的个体,也在这个过程中经历意识

①因篇幅原因,不再列表logist所有变量的分析结果。

形态和文化观念的转型,其中包括性别观念的转型。基本发现是:

其一,两性在性别观念上存在显著差别,男性处于传统—现代连续统的中间状态,女性处于更偏向现代的一端。

其二,两性对于平等性别关系的认知与接纳因城镇化境遇不同而有差别。选择性农转非人群的性别观念得分最高,最偏现代一端,游离者的性别观念得分最低,最偏传统一端。积极参与到城镇化进程中对于女性而言意义重大,城镇化经历对于其性别观念的平等化效应大于男性。

其三,个体的城镇化境遇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户籍出身、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状况、家庭生命周期、夫妻地位关系等,而最为重要的是教育。首先,个体的教育程度能够促进其对性别平等的要求和对现实不平等的感知能力,促进更趋平等性别观念的形成;其次,教育扩张尤其提升了女性的受教育机会,两性教育差距缩小,有利于缩小两性性别规范认知的差距;第三,教育提升了个体把握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机会,相比于男性,女性更多地因为接受较高等程度的教育而在城镇化境遇上处于主动、优势地位,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女性,有更多的机会获得选择性农转非的机会,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并促进了更为平等的性别关系和行为规范的发展。

其四,教育、就业参与、城镇化境遇是社会地位的重要指示器,也是性别角色社会实践的核心表征,其在家庭场域的交互作用重构了以夫妻就业参与和家庭经济依赖为主要特征的家庭性别角色实践样貌,并影响了男性对于男人养家观念的认知与支持,表现为:丈夫工作、妻子不工作的男女,对于男人养家观念的支持更高;夫妻均不工作时,会强化对于男人养家的认知与支持。

5.2 讨论

本文研究证实,性别观念是三种境遇交织影响的结果:教育、职业和收入是社会学意义上最为重要的自致地位,它体现了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经济地位,是性别角色分工的社会实践。以夫妻就业参与和家庭经济依赖为主的夫妻地位关系,体现了由先赋地位(性别、年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劳动力市场地位境遇交互作用所形塑的家庭性别角色分工实践。以户籍、居住和就业形态为表征的城镇化境遇,既是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个体获取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时的机会结构,可以分享伟大城镇化进程中红利的地位境遇,也是拥有不同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本的个体能动性地参与城镇化的状态。性别角色的社会实践、家庭性别角色分工实践、城镇化境遇的交互影响,对性别角色责任期待进行形塑,即男人养家、能力、机会等方面的性别认知。

城镇化为人们提供了教育、就业、收入提升、社会关系网络拓展和分享现代生活方式的机会,城镇化也是一种伟大的教育实践,型塑着人们的期许、认知、价值和行动,包括两性如何分工和相处的规范。积极主动参与到城镇化过程的女性因此在性别观念更趋现代性,两性关系更为平等而获得了更为有利的境遇。

因此,我们倡导一种更为包容性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没有女性的被接纳和包容,城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包容性经济也无从谈起。虽然大量女性参与到了城镇化进程之中,在获得个人各方面提升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但是还是有相比于男性更多的女性,游离在城镇化进程之外。按照18—64周岁已婚、务农、农村居住者的口径对CGSS2015年样本统计,女性游离者是男性的2倍,是中国社会“三留”问题中之“留守”妇女问题的重要写照。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农村电商兴起,为游离在城镇化之外的农村妇女提供了某种参与城镇化的机会,但若仅限于此,是不够的。

同时,我们也倡导进一步巩固女性已有的在教育上取得的成绩,高度关注农村女童的教育,因为教育有利于个体在城镇化进程中有更好的境遇,通过赋能提升女性的地位,通过认知解放促进更为平等化的性别关系建构。

最后,我们认为应该促进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入,一是经济融入,主要体现为就业机会获得上的平等,二是在城镇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融入,主要是要倡导对农村进入城市工作生活者在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调试、包容的文化氛围。三是加快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公共服务和流动人口落地。

参考文献:

- Brines Julie. Economic Dependency, Gender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at Home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4, 100(3): 652 - 688.
- Catherine Bolzendahl and Daniel J. Myers. Feminist Attitudes and Support for Gender Equality: Opinion Change in Women and Men, 1974 - 1998 [J]. *Social Forces* 2004, 83(2): 759 - 779.
- Gibbons J. L., Hamby B. A. and Dennis W. D. Researching Gender - role Ideologies Internationally and Cross - culturally [J].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1997, 21(1): 151 - 170.
- Inglehart R. and Norris P. *Rising Tide: Gender Inequality and Cultural Change* [M]. 200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ockwood David. *The Blackcoated Worker: A Study in Class Consciousness* [M]. 1958.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Ramirez Francisco, Yasemin Soysal and Suzanne Shanahan. The Changing Logic of Political Citizenship: Cross - National Acquisition of Women's Suffrage Rights, 1890 to 1990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 62(5): 735 - 745.
- Shu Xiaoling. Education and Gender Egalitarianism: The Case of China [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04, 77(4): 311 - 336.
- Shu Xiaoling and Zhu Yifei. Uneven Transitions: Cohort - and Period - related Changes in Gender Attitudes in China: 1995 - 2007 [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2, 41(5): 1100 - 1115.
- Thornton A. and Linda Young - DeMarco. Four Decades of Trends in Attitudes Toward Family Issu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1960s through the 1990s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1, 63(4): 1009 - 1037.
- Thornton Arland, Duane F. Alwin and Donald Camburn.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ex - Role Attitudes and Attitude Change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3, 48(2): 211 - 227.
- West Candace and Don Zimmerman. Doing Gender [J]. *Gender and Society*, 1987, 1(2): 125 - 151.
- Williams J. E. and D. L. Best. *Measuring Sex Stereotypes: A Multi - Nation Study*. 1990.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 Wirth Louis.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38, 44(1): 1 - 24.
- 贾云竹, 马冬玲. 性别观念变迁的多视角考量: 以“男主外, 女主内”为例 [J]. *妇女研究论丛* 2015 (3): 29 - 36.
- 刘爱玉. 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J]. *中国行政管理* 2012 (1): 112 - 118.
- 刘爱玉. 男人养家观念的变迁: 1990 - 2010 [J]. *妇女研究论丛* 2019 (3): 42 - 53.
- 刘爱玉, 佟新. 性别观念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4 (2): 116 - 129 + 206 - 207.
- 卿石松. 中国性别角色观念代际传递分析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8 (6): 80 - 91 + 127 - 128.
- 穆光宗. 户籍改革应促进“福利公平” [J]. *中国经济报告* 2014 (7): 45 - 46.
- 乔晓春. 户籍制度、城镇化与中国人口大流动 [J]. *人口与经济* 2019 (5): 1 - 17.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18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OL]. 2018. <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wgk/szrs/tjgb/>.
- 孙晓冬, 赖凯声. 有儿子的母亲更传统吗? ——儿子和女儿对父母性别意识形态的影响 [J]. *社会学研究* 2016 (2): 194 - 216 + 245.
- 谢桂华. “农转非”之后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研究 [J]. *社会学研究* 2014 (1): 40 - 56 + 242 - 243.
- 许琪. 外出务工对农村男女性别观念的影响 [J]. *妇女研究论丛* 2016 (6): 54 - 65.
- 许琪. 中国人性别观念的变迁趋势、来源和异质性——以“男主外, 女主内”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两个指标为例 [J]. *妇女研究论丛* 2016 (3): 33 - 43.
- 杨凡, 曾巧玲. 人口流动对农村已婚妇女性别观念的影响研究 [J]. *南方人口* 2016 (5): 35 - 45.
- 杨菊华, 李红娟, 朱格. 近 20 年中国人性别观念的变动趋势与特点分析 [J]. *妇女研究论丛* 2014 (6): 28 - 36.
- 郑冰岛, 吴晓刚. 户口、“农转非”与中国城市居民中的收入不平等 [J]. *社会学研究* 2013 (1): 160 - 181 + 244.
- 周飞舟, 吴柳财, 左文敏, 李松涛. 从工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到人口城镇化: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社会学考察 [J]. *社会发展* 2018 (1): 42 - 64 + 243.
- 方黎明, 郭静. 中老年“农转非”城市居民的健康风险更高吗 [J]. *财经研究* 2018, 44(1): 142 - 153. ▲